



秦仁昌学派之我见

吴兆洪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 510650)

秦仁昌学派是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 对其理解正在逐步深化。现在想围绕此问题浅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 试谈植物分类学上的发育系统与学派的关系。我认为发育系统也可称为学说。按照学说的释义, 就是学术上自成系统的见解或理论。在蕨类学的研究历史上出现过的系统或学说, 大多有其相应的理论, 但能发展成为学派者为数不多。按照学派的释义, 就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或观点不同而形成自成体系的学术派别。循此深思, 学派就必须有学术核心人物, 提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学说作为基础, 而此学说能影响一群人及其邻近学科围绕着它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并日臻完善, 形成有独特见解和风格的系统理论。因此, 在植物分类学上系统之学派是不尽相同的, 系统(亦即学说)为学派的基石, 但若系统不产生辐射能力, 也就形成不了学派。从系统发展至学派要作动态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理解, 考虑到秦仁昌系统对国内外影响的现实, 我认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秦仁昌学派。

不久前, 有人提出“中国蕨类植物学派”。我觉得这一提法比较含糊, 忽略了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始创历史。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起源是多元的, 在草创阶段, 张景钺、秦仁昌、吴印禅在结束外国人垄断研究中国蕨类的历史上都曾做出了贡献, 但在其后的发展历史中, 秦仁昌的工作占主导地位, 所以秦仁昌后来成为这一学科发展历史的主线。在中国蕨类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 秦仁昌与吴印禅在学术观点上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因此, 笼统地称为“中国蕨类植物学派”, 就会模糊了秦仁昌的学术见解。以笔者之见, 还是称为“秦仁昌学派”更能代表秦老的学术思想。当然, 如果有更为恰当的称谓也是可以考虑采用的。

其次是如何理解国际蕨类学界受秦仁昌系统影响的问题。有些人将这方面理解为国际上的蕨类学者接受秦仁昌系统就是全盘采用, 这样的理解似较单纯。我在讲学中讲到秦仁昌系统(1940)发表后, 国际蕨类植物学的研究(特别是系统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秦仁昌系统的影响, 这里面就表示有程度的差异。影响较深者, 如有些系统就是以秦仁昌系统为蓝本而稍加补充改动。而较多的新系统或蕨类学著作则非全盘照搬秦仁昌系统, 只是部分地接纳了秦仁昌提出的科属概念。翻翻1940年以后出版的蕨类学著作, 无不发现秦老提出的一些科属在其中出现。虽然, 在这种情况下, 秦仁昌系统的影响是局部的或片段的, 但却是明显存在的。秦老在蕨类植物学上的功绩在于世界性的科属研究, 他的重大成就是在蕨类植物的科属概念方面。正因如此, 理解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也是着重于他提出的科属概念方面的渗透力, 这问题的实质也牵涉到对秦老毕生工作的评价。

说到秦老的工作, 我认为必须看到秦老毕生工作的主流。秦老毕生主要致力于蕨类植物科属的概念及其进化过程的研究, 这是秦仁昌系统的真谛。秦老最杰出的贡献是他的1940年系统打碎了经典水龙骨科的樊笼, 引致举世瞩目, 为我国蕨类学研究立足世界奠定了基础。经过秦老研究稳定下来的许多科属概念至今仍为众多的蕨类学家所采用, 部分学者还从自己

的研究工作中反证秦老论点的正确性,这也就是在前面谈及的秦仁昌系统的影响。国内外一些同行曾议论秦老的新种过滥和粗糙。诚然,秦老一生发表了大量新种,难免沙石混杂。可是从份量上看,秦老毕生发表了大约150篇论文和10多本专著,而新种在浩瀚的著作中仅占一隅之地。秦老曾多次讲过,新种只不过是他的研究工作中的副产品,从此也可看出,秦老自己也不认为新种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在秦老发表的新种中,部分是观察十分敏锐且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能够成立的,当然亦有部分正如别人所指的那样是粗糙和过滥的。若沿着秦老的研究历史追溯一下,即可发现过滥的新种较多出现在秦老的晚年,这里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原因,现限于篇幅就不详述了。同时,我觉得在评论秦老的新种时,对象应是合格发表者,一些学者曾把秦老未发表或不合格发表的名称也加以指摘,从命名法规的角度来看,这样就欠公允了。以我之见,在秦老的工作中,粗糙的新种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接着谈谈对秦老先后发表的3个系统(1940、1954、1978)的看法。我的看法是1940年和1978年两个系统是成功的,但1954年系统是倒退的。对1940年系统的看法,我在前几年发表的几篇讲学稿中已反复论及,在此毋庸赘述了。1954年系统是将1940年系统具体应用于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赏试,这一赏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个系统对统一我国蕨类植物标本室的标本管理方式起到规范作用,对科属也有一些合理的处理。但笔者在编写《海南植物志》(蕨类植物门)的应用过程中觉得存在较多问题,有些科的处理甚至比1940年系统后退了。总的印象是在这个系统中,较多的科的概念不够稳定和清晰,同时出现一些混乱,因此在指导我国蕨类植物学(特别是系统学)的研究方面显得不相适应。笔者在参加《海南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时,曾就这些存在问题请教秦老,秦老后来对其系统作过一些修改,对岩蕨科及叉蕨科还作了较大的修改,《海南植物志》蕨类植物门所收载的科属的排列次序就是当时经过修改的1954年系统。但当时已感到此系统的存在问题已非修改所能补救,不动大手术是难以完善的,这一认识对1978年系统的诞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再从同行的反应上也可以看到,1954年系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极微,国际蕨类学著作提到秦仁昌系统时均是指1940年系统,对1954年系统甚少论及,这与1940年系统发表后评论蜂起,发表当年立即授予荷印隆佛氏生物学奖金的情境截然不同。

《中国植物志》第二至六卷(蕨类植物门)原先采用的是1954年系统。在编研工作中对1954年系统屡加改进。这些成果均体现在1978年系统中,因此在1990年决定《中国植物志》(蕨类植物门)改用1978年系统。1978年系统是1940年系统的新发展,吸收了现阶段的新研究成果,体现出当代蕨类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的新水平,它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方法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根据性状相关的程度,对国产科属的亲缘性方面提出了许多改进和观点,稳定了科的范围和明确了属间的亲缘关系,澄清了1954年系统引起的混乱。鉴于此系统对蕨类植物学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989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

但从对国际蕨类学界的影响来看,1978年系统似不及1940年系统。时至今日,国外著述引用秦仁昌系统时仍多为1940年系统。试探其原因,可能是1940年系统虽只局限于经典的水龙骨科范围,但其为世界性的,它的发表促成了国际蕨类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的飞跃;而1978年系统虽然包括整个蕨类植物门,但仅含国产科属,影响地域一般限于东亚地区,有地区性的限制。综观蕨类学的发展历史,亦发现有此现象。但对1978年系统应予肯定的是,它的许多观点是比较进步的,代表了当代的学科水平。

最后想谈一点意见。蕨类植物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学者出版了不少著作,特别是秦老,毕生著述颇丰,还有些手稿尚待整理。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系统整理,编列完整的文献目录(能否在《中国植物志参考文献目录》的基础上进行),以利于教学、科研和生产部门参考。这些都是秦仁昌学派的宝贵财富,它将会促使学派更加兴旺。

新 书 信 息

研究、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工具书 《广西植物志》第一卷出版

《广西植物志》记载广西野生及习见栽培的维管束植物,包括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分为四卷出版。由李树刚、梁畴芬两教授编辑,并有王文采、路安民、张宏达、陈德昭、高蕴璋、李秉滔、莫新礼、方鼎、高成芝、陈秀香、毛宗铮、韦裕宗、韦发南等教授、学者参加撰写的本志第一卷已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广西植物志》第一卷收载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木兰科到桃金娘科(按哈钦松系统),共84科、353属、1380种、3亚种、121变种、17变型,对科、属、种(含亚种、变种和变型)的名称、形态特征(着重对比特征)、产地、生境、分布及经济用途等均有扼要记述,科下有比较详细的分属和分种检索表,并有植物形态特征比较图或全图的图版356幅(含982种),占收载植物种类总数的64.6%,以便认辨。本志可供植物学、农业、林业、园艺、医药、轻工等部门工作者及有关的教学、生产部门参考应用。

本志为16开本,共110万字,975页,每本定价平装30元,精装35元。欲购此书者,可向当地新华书店购买或向广西植物研究所分类室邮购,每本加收挂号邮费2元。书款可信汇或邮汇到广西桂林市雁山广西植物研究所分类室,邮政编码541006,开户银行:广西桂林市农行雁山营业所,帐号43103,请写清楚购买书名、册数及购买人姓名、邮址。